

## 從國際貿易港到罪惡之城：澳門賭博業發展史(開埠至二次大戰)

### 1. 簡介

不論你身處在那個時空、那處地方和接受那一種文化，均可發現林林總總的賭博活動，根據文獻記載，中國的賭博活動已有四千多年歷史，而巴比倫、埃及和印度亦早於公元前 1800 年、1600 年和 1000 年開始有不同形式的賭博活動出現。可見，賭博行為是人類社會中，一種自古常有的宇宙性現象。<sup>1</sup>

戈春源指出，「賭博來源於遊戲娛樂，把貪求物欲的功利性與競賽智力、鍛鍊思維的技巧性相結合，具有周而復始的間歇性刺激。牌桌上的競爭、贏後的喜悅恰恰滿足了人性這種戰勝對手的潛意識和真切的快感，這就是賭博長期存在的心理原因。」<sup>2</sup>正因為這種自古常有的宇宙性現象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都揮之不去，配合周遭國家的禁賭政策和日漸衰落的轉口貿易帶來的機遇，澳門慢慢將自身的經濟發展成如今有「東方蒙地卡羅」之稱的現代化賭城。

相信很多香港人還記得在去年澳門回歸五周年的慶典上，國家主席胡錦濤向已離任的特首董建華「訓話」，希望他查找不足，努力改善施政。另一邊廂，胡主席不斷讚揚澳門特首何厚鏞，嘉許其辦事能力，帶領澳門經濟走出回歸前的谷底，根據澳門經濟局的估計，澳門在 2004 年度的本地生產總值(GDP)較去年上升約 25%，遠高於 2003 年的 15.6%和 2002 年的 10%，何厚鏞更被內地省市首長推選為全國最佳地方首長，鋒頭一時無兩，相比之下，香港顯得黯然無光。究竟這個現時人口只有四十多萬，面積比九龍半島還要小的城市之過去如何成就今日的神話呢？

其實，當時的歐洲海上霸主葡萄牙早於十六世紀初期已東進亞洲，在「進佔」澳門前，葡萄牙先在馬六甲成立其在東亞區的首個殖民地。基於澳門位處東西文化和商業交匯的樞紐，因此當時的葡萄牙政府早已對澳門這塊彈丸之地深感興趣，在明朝嘉靖年間(1557 年)，當時葡萄牙船隊因在澳門對開海岸遇上暴風，船隊運載的貨品被水浸濕，遂要求登上澳門，在岸上晾曬貨品。<sup>3</sup>葡萄牙船隊登上當時的澳門時，澳門還是一條漁村，但由於澳門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對葡萄牙的戰略價值，葡萄牙政府在 1582 年向當時的明朝政府提出以每年 500 兩銀租用澳門，但當時的中國政府仍享有澳門的主權，此後，葡萄牙人開始在岸上搭建房屋，並將澳門變成當時的國際貿易港。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積弱，無力與列強周旋，葡萄牙政府遂向清政府提出要求，並於 1887 年獲清政府同意，讓葡萄牙永久管理澳門，從此，澳門正式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sup>4</sup>

<sup>1</sup> Jan McMillen. (1996). "Understanding Gambling: History, Concepts and Theories" in *Cambling Cultur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 Jan McMillen (eds.). Routledge. Page6-42.

<sup>2</sup> 戈春源。(2004)。「賭博的起源與動機」。《賭博史》。華成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18

<sup>3</sup> 鍾連城。(1999)。「風雨中賭國巍巍」。《澳門教父(上)》。三誠堂出版社。頁 1

<sup>4</sup> Christina Miu Bing Cheng. ((1999). "Introduction." *Macau: a Cultural Janu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age1.

## 2. 澳門經濟演化成「賭城」的過程

澳門經濟自 1557 年開埠以來的數百年間，其經濟因外部環境的轉變而出現 180 度的變化，大致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澳門開埠至鴉片戰爭前的二百多年間，澳門扮演著東西文化、經濟交流的中心樞紐、第二階段是鴉片戰爭後至十九世紀末，澳門當時的經濟以非法販賣人口、偷運鴉片和賭檔為主，第三階段，與第二階段有部份時間重疊，是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以賭業為主要經濟命脈的發展方向。

### 2.1 第一階段：開埠至鴉片戰爭前

正如前文所述，葡萄牙人定居澳門後便立即以澳門為基地和中轉站，致力推動東西方貿易，各國商人匯聚，並與中國發展轉口貿易。澳門很快便從昔日的小漁村發展成當時全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廣州的外港，成為遠東最繁榮的商埠。

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後期是澳門發展成國際貿易港的全盛時期，當時澳門的海上貿易路線主要有三條路線，分別為澳門—果阿—里斯本航線、澳門—長崎航線和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航線。<sup>5</sup>

澳門—果阿—里斯本航線：當時的葡萄牙商人對中國的絲、絹、麝香、珍珠、象牙製品和陶瓷甚感興趣，他們在澳門購入這些商品後，會將部份貨物在印度的果阿轉售，並在印度補購一些香料、檀香和蘇木等商品後，再運往歐洲傾銷。與此同時，葡萄牙商人亦會從歐洲將葡萄牙酒、鐘表和毛織品等經澳門運入中國。<sup>6</sup>

澳門—長崎航線：明末清初，鑑於「倭寇之亂」，中國嚴禁中日商人私下通商和有任何的貿易往來，這使在澳門葡萄牙商人扮演著中日貿易的橋樑角色，壟斷了中日兩國的貿易。每年初夏，葡萄牙商人均會將中國的絲綢運往長崎，並將日本的白銀和土產等運回中國銷售。<sup>7</sup>

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航線：這條航線是中國與美洲貿易的最早航線。在澳門的商人先將中國的絲綢、生絲、棉花、糖、銅和鐵器運到菲律賓，再由當地的西班牙商人運往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和南美的智利，商人再將當地賺取的白銀運回中國。<sup>8</sup>正因為當時澳門轉口貿易的繁盛，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也可在澳門找到，令澳門由一條寂寂無名的漁村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國繁盛的國際大都會。

澳門地處中國沿海南部，與中國當時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廣州相距甚近，在當時中國與世界交往的海上航線享有極有利的位置。而且，清朝的時期，中國的商品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這推動了當時中國沿海地區的絲綢和陶瓷等手多種相關的手工業的崛起，為前往中國通商的

<sup>5</sup> 蔣健成。(1999)。「澳門對外經濟貿易」。《澳門：珍藏版》。珠海出版社。頁 162

<sup>6</sup> 鄭開頌、謝後和。(1999)。「早期經濟文化的發展」。《澳門歷史與社會發展》。頁 44

<sup>7</sup> 同上，頁 45

<sup>8</sup> 同上 46

商人提供適合當時歐洲市場需求的貨品，而當時中國實施的海禁政策剛好造就了澳門的崛起。況且，葡萄牙憑藉當時的海上優勢和強大的船隊，近乎壟斷了當時歐洲通往遠東的航道，澳門當時作為葡萄牙在中國和遠東的重要據點，其轉口貿易當然也得到顯然的發展。<sup>9</sup>

## 2.2 第二階段：鴉片戰爭至 19 世紀末

1842 年鴉片戰爭戰敗後，清政府將香港割讓予英國，又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五口通商，令澳門失去近兩世紀的中外通商的壟斷地位。<sup>10</sup>加上隨著歐洲工業革命後，科學技術得到顯著的發展，使海上交通進入了汽船的年代，船身亦因而不斷增大，令澳門的港口未能滿足當時的需求，於是水深港闊的香港取代了澳門的地位。<sup>11</sup>

鴉片戰爭後，列強不斷在中國開劃租界，讓外國人可在當地居住，這令當時在中國通商的外國商人不再須要留守澳門一地，可以往中國其他大城市通商和居住，持續不斷的遷移促使澳門的國際貿易港角色衰落，經濟也一落千丈，當時有很多原來居住在澳門的外國人、甚至葡國人紛紛遷往香港。<sup>12</sup>

爲了挽救日漸衰落的澳門經濟，葡萄牙女皇在 1845 年單方面向外宣佈澳門爲「自由港」准許所有外國商船在澳門登岸，並委任亞瑪勒(Ferreira do Amaral)爲當時的澳門總督，在澳門實行殖民化統治，<sup>13</sup>希望藉加大控制權來維持澳門當時對葡萄牙的財政支持。可惜，澳門根本無法面對香港的正面競爭，結果澳門經濟發展至此階段只能依賴販賣鴉片和廉價中國勞工維持。

其實澳門在清初時，葡萄牙人已經從印度經果阿販賣鴉片到澳門，每年約 2 0 0 箱。及至鴉片戰爭前夕，由於清政府在中國實施全面禁煙，令當時的外商大多經澳門將鴉片輸入內地，正因如此，當時運入澳門的鴉片竟增加至高達每年 4 萬箱，令澳門成爲當時中國最大的鴉片走私中心，1 8 3 9 年欽差大臣林則徐更曾親自巡視澳門，可見情況的嚴重性。<sup>14</sup>

隨著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後不斷與外國簽訂不同的條約，鴉片漸漸可以合法進口中國，澳門的鴉片走私貿易亦逐漸衰落。不過取而代之的卻是另一種不道德商業活動——人口販賣（賣豬仔）。隨著 19 世紀歐洲國家的殖民擴張，尤其是英國，列強在各殖民地的人力需求大大增加，因爲她們急需大量廉價的勞力開發當時的殖民地。加上當時美洲經濟的發展，令美國、秘魯和古巴等國家對勞工的需求增加。看準這個成本低、高回報的「商機」，當時的外國商人將中國的工人轉送往澳門，再經澳門非法將工人送往東南亞、西印度、美洲和其他英屬殖民地。根據資料，販賣豬仔的毛利竟高達 800%，這道明爲何在澳門的豬仔館由 1856 年的 10

<sup>9</sup> Leong Wan Chong, Ricardo Chi Sen Siu. (1997). "Historical Progress of the Macau Economy". Macau: A model of Mini-Economy. University of Macau Press. Page24-31.

<sup>10</sup> Same. Page32-35

<sup>11</sup> 蔣健成。(1999)。「澳門對外經濟貿易」。《澳門：珍藏版》。珠海出版社。頁 122

<sup>12</sup> 鄭開頌。(1999)。「鴉片戰爭與澳門」。《澳門歷史(1840-1949)》。珠海出版社。頁 31-33

<sup>13</sup> Wu Zhiliang. (2003). "Ambergris and Opium in Macau's History" Macau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Macau Ricci Institute. Page76

<sup>14</sup> 鄭彭年。(1999)。「林則徐澳門之行」。《重放的蓮花—澳門開埠 450 年》。新華出版社。頁 144-147

間上升至 1866 年的 40 間，<sup>15</sup>及後由於當時的英國、法國和德國政府強力反對和大力打擊中國境內的販賣豬仔情況，令澳門的販賣豬仔活動在 1873 年正式終止，<sup>16</sup>但當年的豬仔館的數目已上升至高達 300 間，可見問題的嚴重性。<sup>17</sup>

## 2.3 第三階段：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中葉

其實博彩業在 19 世紀中期已經在澳門出現，博彩業與當時的豬仔販賣更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因為當時的賭檔大多由豬仔館兼營，澳門的工人或苦力因染上賭癮，欠下無法償還的債務，最終只好賣身往列強的殖民地當勞工，這不但為豬仔館提供大量的勞工供應，更直接振興了當時澳門的博彩業。<sup>18</sup>而 1847 年更是澳門賭博史的轉捩點，因為當時葡萄牙政府將澳門脫離印度果阿的行政管轄，與滄汶和蘇祿群島經成一個獨立的管轄區。<sup>19</sup>澳葡政府為確保管轄區的財政獨立和支持滄汶和蘇祿群島的管理開支，澳葡政府遂在當年決定批出博彩牌照，准許賭檔合法在澳門經營，政府在發出牌照和賭檔營利中抽稅。<sup>20</sup>

當時澳門的主要賭博方式主要有骰寶、山票、鋪票、字花、字胆、白鴿票等，而最受大眾歡迎的是「番攤」，在 19 世紀 50 年代，澳門的「番攤」賭館已有 200 多間，<sup>21</sup>使澳葡政府每年的收入激增至 20 餘萬。<sup>22</sup>所謂「番攤」，其實是指莊家從一大堆的銅錢、鈕扣或豆中取出一小部份放入碗內，賭客可在一至四間投注，投注後莊家會將碗打開，並按四粒為一組撥開碗內的銅錢、鈕扣或豆，直至餘數少於四粒為止，賭客若能估中碗內的餘數為之勝出。<sup>23</sup>

1872 年，港英政府開始在香港厲行禁賭，在 1 月 20 日，政府宣報「所有開賭牌照一律宣告取消。嗣後本港、九龍及所屬鄉村地方一切大小賭博，悉行嚴密查禁。」<sup>24</sup>這使大批香港賭客紛紛前往香港，為禁止販賣豬仔的澳門經濟注入新動力。1875 年，廣東禁止曾盛行一時的「圍姓」賭博，令當時經營「圍姓」的商人紛紛遷往澳門經營，而當時的廣東居民亦跟隨至澳門投注，使當時的投注從不同的方法流入澳門。當時澳葡政府單從「圍姓」賭博所收取的賭餉就高達每年數十萬。<sup>25</sup>由於當時博彩業的興盛，令澳門成舉世聞名的東方賭城，有「東方蒙地卡羅」之稱。

1934 年，澳葡政府對批出營運賭場的牌照進行大改革，將所有賭博營運權集中，統一競投，結果由傅老榕和高可寧合組的「泰興娛樂總公司」以 30 萬澳元的標價投得專營權，壟斷

<sup>15</sup> Leong Wan Chong, Ricardo Chi Sen Siu. (1997). "Historical Progress of the Macau Economy". Macau: A model of Mini-Economy. University of Macau Press. Page 37-38.

<sup>16</sup> 鄭開頌、謝後和。(1999)。「都市化的歷程」。《澳門歷史與社會發展》。頁 137-139

<sup>17</sup> 鄭彭年。(1999)。「苦力貿易」。《重放的蓮花—澳門開埠 450 年》。新華出版社。頁 137-139

<sup>18</sup> 費成康。(1988)。「蛻變為藏垢納污之地」。《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317

<sup>19</sup> 鄭開頌。(1999)。「澳門的社會經濟」。《澳門歷史(1840-1949)》。珠海出版社。頁 222

<sup>20</sup> Austin Coates. (1987). "Sovereignty". A Macao Narra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ge 98

<sup>21</sup> 費成康。(1988)。「蛻變為藏垢納污之地」。《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317

<sup>22</sup> 戈春源。(2004)。「中國歷史上的賭場賭屈」。《賭博史》。華城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168

<sup>23</sup> 費成康。(1988)。「蛻變為藏垢納污之地」。《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317

<sup>24</sup> 馬源《香港法例匯編》第一卷(乙)第九十頁。轉引自 戈春源。(2004)。「中國歷史上的賭場賭屈」。《賭博史》。華城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178

<sup>25</sup> 同上，頁 169

了澳門整個賭彩業，而「泰興娛樂總公司」每年需向澳葡政府繳交約 180 萬澳元的博彩稅。<sup>26</sup>

「泰興娛樂總公司」奪取賭博專營權後，先後開設三間賭場，經營番攤、骰寶、百家樂、白鴿票等博彩活動，並設有酒店、跳舞場、遊戲場和茶室等，標榜所謂的「高尚娛樂」。<sup>27</sup>這一時期，與賭業相輔相承的還有鴉片煙業和娼妓業。1946 年前，在澳門吸食鴉片是合法的，當時澳門有超過 50 間煙館、超過 1000 張煙床。<sup>28</sup>而單計 1938-1940 年兩年間，澳門有超過 120 間妓寨、1500 多名妓女，<sup>29</sup>可見鴉片煙業和娼妓業的興盛程度。

1937 年抗日戰爭和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相繼爆發，廣州、香港先後淪陷，澳門因葡萄牙政府保持中立而免被日本侵佔，這令大量難民從香港和中國內地湧入澳門，令澳門的人口由 1936 年中國正式向日本宣戰前的 12 萬人大幅上升至 1941 年香港淪陷後的 40 多萬人，當中不乏家財萬貫的富豪，這為澳門的經濟帶來更多動力和資金，令原來的賭博業、鴉片煙業、娼妓業和酒店業更加興旺。<sup>30</sup>不過，澳門的人口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大幅回落至六十年代初賭博專營權轉手前的不足 20 萬人。總括而言，澳門賭博業在專營權轉手前仍停留以舊式的賭博玩意為主。

### 3. 澳門專注發展賭博業的因素

雖然葡萄牙自十六世紀開始取得澳門的行政權，但直至十九世紀後期清政府正式承認葡萄牙擁有澳門的永久管治權，澳門名義上仍是中國版圖內的一個小城市，因此，中國和葡萄牙政府均沒有原動力將澳門發展成一個有活力的經濟體系。因為在清政府眼中，澳門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城市；而在葡萄牙政府眼中，澳門初期的角色是轉口貿易，因此葡萄牙政府並未有就碼頭以外的設施大興土木。所以，澳門一直以來也沒有發展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系。

即使葡萄牙在十九世紀後期確立其在澳門的管治權，但這並不代表葡萄牙政府會在澳門發展有競爭力的工商業，因為葡萄牙政府當初看中澳門的原因是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澳門對當時葡萄牙政府的遠東貿易甚有價值。正因如此，葡萄牙政府並不會貿然投放資源在澳門發展工商業，因為這與其當初將澳門成為其殖民地的原因相違背。

不單如此，澳門成為葡萄牙殖民地後，在政治和經濟上相對地失去了中國政府的支持，沒有腹地廣大的中國在背後的支持，以澳門在當時的數千人口、地理面積不足 2 平方公里的城市來說，要發展低技術和勞工密集的工業也十分困難，更可況自歐洲工業革命後，西方的工業不論在生產技術、效率，或是成本和品質均不斷改善，令當時澳門要發展有競爭力的工業變得更加沒有可能。

<sup>26</sup> A. Pinho. (1991). "Gambling in Macau" in 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Continuity and Change). R.D. Cremer (eds.). API Press. Page 249

<sup>27</sup> 鄭開頌。(1999)。「澳門的社會經濟」。《澳門歷史(1840-1949)》。珠海出版社。頁 223

<sup>28</sup> 同上，頁 242

<sup>29</sup> 同上，頁 237

<sup>30</sup> 鄭開頌、謝後和。(1999)。「澳門與抗日戰爭」。《澳門歷史與社會發展》。珠海出版社。頁 130-133

其實，即使澳門未能發展具競爭力的工業，以其當時在國際貿易航道的地理優勢，澳門扮演中西貿易的中間人角色理應仍有發展和生存的空間。不過，自香港在 1842 年割讓予英國，而上海、寧波、福州、廣州和廈門相繼對外開放後，澳門失卻了其在中西國際貿易的壟斷地位。由於工業革命令當時用作航運的貨船蒸氣化，這令貨船的船身大大增大，因此，澳門的港口已不能滿足當時的航運需求，所以當時的商船紛紛轉往水深港闊的香港。

澳門脫離中國的管治，一方面窒礙了澳門發展第二產業的機會，但另一方面卻為澳門發展賭博業帶來契機。因為澳門鄰近的中國內地和香港均先後實行賭禁，因此當時的賭博營辦商紛紛遷往澳門，而當時在內地和香港的賭客亦乘船往澳門投注，這為澳門持續不振的經濟帶來資金和動力，令澳門經濟重現生機。

更可況澳葡政府將絕大部份在澳門所賺取的資金運回葡萄牙，令澳門的資本難以在當地積累，因此，澳門只有發展賭博業才能一方面確保源源不絕的資金流入澳門，另一方面讓澳葡政府在澳門投入最少資源的情況下，保持澳門經濟的活力，為葡萄牙政府提供穩定而可靠的收入來源。

正因為澳門本身的條件窒礙了其發展具競爭力第二產業的可能性，而土地資源的貧乏亦令澳門無法發展第一產業，因此，澳門一直倚靠第三產業來支持其經濟。可惜，香港開埠動搖了澳門在中西海上貿易的壟斷地位，而澳葡政府為了確保其在澳門的收入以支持遠東的開支，在當時周邊地區和國家的禁賭政策配合下，令澳門發展成以博彩業為主體的城市。

#### 4. 總結

在澳門開埠的幾百年來，澳門經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巨變，由國際貿易港蛻變成罪惡之城，回想當初，澳門是歐洲通往南亞(印度)和東亞(中國、日本)地區的海上交通樞紐，在國際貿易往來上，起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可惜，基於澳門自身的發展條件，澳門經濟的競爭力在香港開埠後被大大削弱。為了確保穩定的財政收入來源，澳葡政府不得不容許販賣苦力、鴉片和賭博等「罪惡」行業的存在，結果澳門慢慢發展成以賭業聞名，有「東方蒙地卡羅」之稱的著名賭城。

澳門的賭博業在 1962 年有了特破性的發展，以何鴻燊、葉漢、葉得利和霍英東合組的「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投得澳門的博彩專營牌照，<sup>31</sup> 自此，澳門的博彩業亦踏上現代化和專業化，成為澳門旅遊業和經濟的一大支柱。不過，觀乎澳門現今的博彩業仍停留以黃、賭為吸引旅客的賣點，只不過是在賭場內引進了一些西方的博彩玩法，從本質上看，澳門的經濟在第三階段後，並沒有長足的發展。

---

<sup>31</sup>鍾連城。(1999)。「澳門賭業換朝代」。《澳門教父(下)》。三誠堂出版社。頁 323-340